

“双碳”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 安军靖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阐明,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自18世纪中叶起,化石燃料随着工业化进程得到广泛使用,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各项活动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种植养殖、工业生产、电力生产、交通运输、取暖制冷等产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向大气层释放着温室气体,继而引发了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危机,碳中和势在必行。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如期实现“双碳”目标,要求我们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是必由之路,任何“一刀切”“运动式”“片面化”的举措都将适得其反。

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工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碳、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使中国传统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步且处于高位。必须在绿色低碳转型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全面创新,广泛推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正如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达成“双碳”目标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协作。需系统性通盘谋划,制定覆盖全面、节奏明晰的“双碳”路线图,处理好产业间、城乡间、地区间、国内与国际、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低碳与民生的关系。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成好这一任务,必须保持投资的合理必要增长。离开投资,无论是创新战略实施,还是产业优化升级,都难以实现。如果说制造强国是目标,投资就是把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载体。

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后,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之位,同时也开启了由大到强的历史进程。然而,愈进愈难,新进程的起步并不容易。在国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冲击影响下,我国制造业投资增幅放慢。2011—2016年,增速从31.8%下跌到4.2%。2017年、2018年反弹回升,随后又开始下跌。2021年上半年恢复正增长,但2019—2021年年平均增速2%。制造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0%以上,其投资幅度的放慢导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步下跌。2011—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3.8%下降到2.9%,给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压力。同时,投资增幅的放慢使得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滑,从2010年的32.5%降为2020年的26.2%。

从产业发展规律和主要发达国家实践看,制造业比重在达到一定程度

需出台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推动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积极采用节能绿色低碳技术;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绿色新兴产业和低碳技术;坚决打击违法的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同时,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全社会培育绿色发展文化氛围,在消费环节中有意识地节约能源、避免浪费,主动尝试更加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适度放宽市场准入制度,积极从国外引入资金、先进技术和理念,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

实现“双碳”目标将会带来覆盖各行各业的长期调整,但这种调整不能以损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代价。为实现“双碳”目标所推行的一切变革,都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让全社会都能享受到绿色低碳发展的福祉。

稳步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等减碳工作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以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安排、整体性推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坚持前瞻性思考。在2030年碳达峰的基础上,聚焦2060年碳中和最终目标。深入论证“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在能源生产、能源消费、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方面科学谋划战略举措和重点任务,按照2030年、2060年两个重要节点制定分阶段行动计划,避免走回头路、翻烧饼。

坚持全局性谋划。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好政策对创新的引导作用、市场对创新的支持作用,突破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产业应用到市场推广的掣肘和瓶颈,真正实现绿色低碳技术在各领域的市场化布局。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制定差异化的策略。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推进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确保能源安全。

坚持战略性安排。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

产国和消费国,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条件显著改善。尽管我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面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我国的能源体系在能源转型中需遵循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在低碳化发展进程中,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坚持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依靠科技创新,持续推进并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

坚持整体性推进。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制度优势,激发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落实各方责任。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挥好绿色金融对各产业低碳转型的支持,推进清洁生产,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低碳改造。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推动实现能源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能源发展“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能源发展指明方向。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无论是从碳中和角度还是高质量发展角度看,低碳转型的核心都是节能。这都需要坚定调整产业结构,严控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规模。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利用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提高能量利用效率,推动低能耗、低排放的新兴技术加速商业化。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大力优化工业耗能,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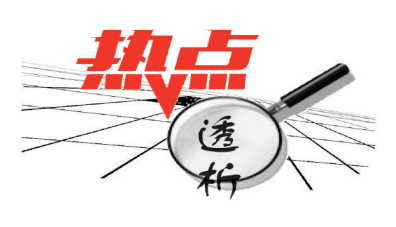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为实现“双碳”目标,能源供给侧减碳是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段之一。这需要着力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

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作为未来能源供应增量主体和主导能源。同时,将核能作为实现能源低碳发展的重要基荷能源。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在新型电力系统中作为短期的兜底能源和中长期的辅助能源。通过系统规划、有序实施,逐步形成风、光、水、火、核多能互补的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

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这需要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将绿色低碳技术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能源生产方面,重点攻关新型光伏电池、海上/高空风电、氢燃料电池、高效储能等前沿技术。持续推动核能技术的进步,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提高核电的经济性,降低绿色溢价。能源消费方面,引导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等高耗能领域更广泛地采用智能化、电气化技术,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固碳技术方面,鼓励企业、高校研发碳捕捉技术,加速商业化进程。

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能源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发电企业要坚持降本增效,加大新能源比例,积极探索分布式电厂和能源综合服务新型商业模式。电网要进行深层次的角色转变,从传统仅负责输电的“物流商”升级到提供能源解决方案的“服务商”,顺应电力系统分布化的趋势,为用户提供发用储一体化能源解决方案。

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加大海外能源类矿产开发力度,重点关注低碳背景下的稀缺金属资源。鼓励外资参与国内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在不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域,允许外资控股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以“鲶鱼效应”促进国内同类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



为促进制造业投资合理增长蓄势添能

□ 尉高师

是企业投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求的长期低迷消蚀了对制造业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导致企业不敢投资。

其次,需求的长期萎缩使得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制造业盈利状况恶化。2000—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利润年均实际增速超过20%,但2011—2020年仅有0.23%,其中,2018年、2019年连续绝对减少,2020年虽略有回升,但尚不及2016年的水平。利润是驱动投资的核心动力,利润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资本离开制造业,投向其他行业领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利润下降,制造业研发投入也开始缩减。2011—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11.4%,其中2018年、2019年不足8%。

再次,盈利状况的恶化导致制造业还贷违约情况成倍增加,融资能力持续减弱。从2013年开始,各银行制造业贷款占比不断下降,2020年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2012—2018年,其制造业贷款不良率从1.61%上升到5.76%,上升了2.58倍。2019年起,这一趋势开始扭转,但2020年仍高达4.2%,为2012

年的2.6倍。相应地,其制造业贷款占公司类贷款比重从2012年的23.8%下降到2020年的15.9%,减少了近1/3。其间,2015—2018年还出现了贷款额的绝对减少。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贷款占到制造业外部融资的65%以上,贷款的持续缩减意味着即使企业想增加投资也可能难以实现。

可以看出,过去十年我国制造业投资持续走低,根源即在于需求的萎缩不振。2021年以来,在我国出口高速增长带动下,制造业投资由负转正、稳步增加。促进制造业投资合理增长,需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化需求的支撑带动作用。同时,发挥好银行的主导作用,强化金融对制造业的有效支持。

一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制造业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需求的疲弱不振不仅会造成经济循环淤堵,而且会削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力,延缓产业升级进程。在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调整阶段,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新一轮产业革命仍在孕育突破之中,加之人口老龄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指出,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资本市场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促进科技与资本融合、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何此时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由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组建,旨在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交易所。作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新三板,自2012年7月创立以来,已发展成为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重要平台。新三板2016年初步划分为创新层、基础层,并于2020年设立精选层,逐步形成了与不同层次企业状况相适应的差异化发行、交易等基础制度,建立了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为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提供全口径服务。由新三板精选层平移而形成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突破体制机制上的发展瓶颈,牢牢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尊重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律,有效提升市场效率、激活市场活力,努力探索了一条新三板支持服务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普惠金融新道路。

北京证券交易所为什么能够有效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建构了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的制度安排。区别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要侧重于服务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侧重于服务创投和中小企业(中小板)的定位,北京证券交易所坚持聚焦“更早、更小、更新”,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打造更为便利的股权融资平台,充分体现市场包容性和服务精准性,强化各市场板块之间的功能互补,不断扩大资本市场覆盖面,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建立了适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发行上市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融资准入方面上市门槛设置为市值2亿元,制定上市标准“四选一”规则,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股权激励、股份减持等方面实行差异化制度安排,精准解决科技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制定了差异化创新型中小企业“进”“退”机制。维持“有进有出”“能进能出”的市场生态,构建多元化的退市指标体系,完善定期退市和即时退市制度,在尊重中小企业经营特点的基础上,强化市场出清功能。

北京证券交易所如何更好地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就是要多措并举形成合力。紧紧围绕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不断强化政策实施的宽度、深度和协同度,持续提升服务创新性中小企业的水平和成效。发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纽带作用。打造创投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区域性股权市场—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恰逢其时

□ 蒲实

新三板—交易所市场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处理好与沪深交易所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错位发展、互联互通的关系,形成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的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强化创新型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配套资本支撑。把握创新性中小企业梯度成长的融资发展脉络,逐步形成北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的梯度资本市场格局,构建前后输送关系,实现创新性中小企业梯度培育行稳致远。打造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专业化平台。聚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持续探索差异化的特色制度安排,形成科技、创新和资本的聚集效应,实现产业链与金融链互促互融共生,以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目前,我国制造业盈利状况明显改善,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未雨绸缪,需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防止大宗商品价格不合理增长,努力提升制造业利润水平。

三是推动金融体系创新,强化金融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支持。目前,贷款占到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3以上、增量的1/2以上。促进制造业投资发展,发挥好金融的作用至关重要。真正使金融与制造业同舟共济,需推动两者激励相容和深度融合。鼓励支持商业银行以投资银行思维和金融科技手段创新服务、提高效率,深化对产业发展规律和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掌握,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分享制造业发展的红利。同时,减少银行对息差收入过度依赖。目前,利息净收入占到银行营业收入的70%以上。这种经营模式下,银行只是获取固定利息收入,缺乏关心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内在动力。这需要逐步减少银行对息差收入的依赖,倒逼金融体系转变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投身服务于制造业创新发展。

